

第一章 外部环境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将考虑美国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在第二章 我将讨论大学 特别是专业性学院所面临的一些特别的困难。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将分别指出什么是普通教育 什么是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深受混乱的困扰。这种混乱开始于中学，并一直延续至大学的最高层次。中学不能确定是为学生将来的生活作准备，还是为他们进入大学作准备。它们的学生多种多样，但是课程却相当一致 没有考虑到学生们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律师、职员或劳工。这种课程显然只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需要，即预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需要。

在大多数地方，初级学院 (junior college) 是中学的延续，其学生大体与中学相似 只不过人数较少罢了。在这里 也存在学生是在此结束其教育，还是准备继续进大学深造这一问题，而且这种机构的目标也不明确。

文理学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有一部分属中学性质 有一部分属大学性质 有一部分从事普通教育 有一部分从事特殊教育。它时常看上去像一所师资培训机构，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它所颁发的学位似乎证明，学生已平安地通过了一个

阶段 在这个阶段 他们没有触犯任何地方、州和联邦的法律；同时也证明 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东西有良好的（即便是暂时的）记忆。正如我稍后要表明的那样 人们很少提及学生所学的许多东西具有多大的价值。

大学与学院 college 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专业性学院 professional schools 和博士学位。目前 我不知道大学为什么应该有专业性学院，或这些专业性学院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专业性教育包括重复前人留下的规矩，或不同程度地发展我们认为更加有效的各种理念。博士学位因为成了学院或大学教师的一个必要标志而丧失了其他意义。然而 大学还要从事研究工作 并希望训练研究人员，授予博士学位是对研究的认可。那些将要成为教师的学生 接受的却是一种培养研究者的教育。大学本科的教学、课程、学习内容及培养目标和中学一样混乱。

当然，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夸大了高等教育的困境。实际上 它也有许多令人羡慕的优点 至少它能友善地接纳任何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人士。不过作为投身于高等教育的人士，我们也应该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汲取些什么。直至本次大萧条开始，要求增加教育机会的呼声还非常高。任何以教育的名义出现的事情都是好事，就是因为它们借着教育的名义。我认为 教育的魔力已经失去 如果我们希望保持我们拥有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计划。正如过去几年的情况所表明的，我们的人民将在经济的压力下盲目前进 他们将破坏最好的东西 同时却将那些最坏的东西保留下来，除非我们使他们更清楚地对这两者作出甄别。

如果接下来的问题是讲清楚高等教育，那么就让我们考察一下高等教育之所以混乱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非常粗俗，就是追逐金钱。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这很可悲，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教育领域的资金有三个来源，即学生、捐赠者及立法机关。制定一项能吸引其中任何一类人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我曾提出的那样，这经常也是徒劳的。如果学校董事会能够拒绝那些仅仅反映富人们一时兴趣的捐赠，那么大学现有的混乱局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消除？一所大学所接受的有限捐赠，从来没能偿还为得到此捐赠所付出的代价。富人们如果提供了资助，他们可能就不会向大学提供相应的场所或所需的图书和设备；如果提供了场所，可能就不会提供这些场所的维护费用；如果提供了场所的维护费用，可能就不会为这些场所配备人员。仅仅从财政的角度看，与获得捐赠之前的情况相比，大学在获得捐赠之后的情况反而更糟。从教育和科学的角度看，大学可能会失去平衡，走向混乱。对捐赠者一时兴趣的依赖，意味着没有人能搞清大学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只要有人愿意出资，不管什么都会成为明年的政策。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大学不需要钱，或大学不应该尽力去争取资金。我只是想大学应该有一个教育政策，然后努力为之筹措经费，而不是让财政上的一些偶然事件决定其教育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学费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公正地说，美国大学应该尽量减少来自学生方面的收入。这是真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大多数有损自身声誉的事情都是为了维持或增加这方面的收入。为了维持和增加这方面的收入，公

众一时的兴趣也和那些百万富翁的一时兴趣同样受到关注。如果公众对都市报纸感兴趣，那么新闻学院就会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公众对大企业的发展怀有敬畏之心，那么同样受到尊重的商学院也会纷纷出现。如果一个行政当局由于扩大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导致公务员队伍的增加，那么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就会成为大学的首要责任。目前，公共行政、住房、林业以及航空是大学最具吸引力的学科 就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热衷于学习国际关系一样。犯罪、离婚、童工、公费医疗制度以及律师的腐败 随时都可能通过一些突发事件成为高等教育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无疑 对金钱的追逐以及相应的对公众要求的敏感 与将大学看做是服务站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这种观念，大学必须扩大自身在社区中的影响，必须使社区不断地和普遍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一所州立大学必须帮助农民照看他们的牛群；一所捐办大学必须通过在下午和晚上时间授课 帮助成年人得到更好的工作。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教授可能有别于那些致力于发展教育和增进知识的教授。既然一所大学不能有两类教授，与此同时仍然对自身的目标有明确的认识，那么推广工作只会造成学校的混乱。

大一和大二学生与那些从事研究生水平和专业性学习的人使用同样的教室及实际上同样师资队伍，很难说有什么合理的地方。除非我们在大学前两年将所有不可能成为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学生，或者应该在心智培养方面采取特别措施的学生排除在外 否则我们必定会使一所本应致力于学术、专业性教育和心智训练的高校产生混乱。至少，在大多数州立大学，并没有人主张大一和大二学生是大学应该提供的这类智

力工作的对象。在这里 他们的出现是出于民主的观念 对此我稍后再作叙述。不过 在那些捐办的高校 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的出现是出于对金钱的追逐。如果失去这些学生 大学的收入将受到损失。而且 因为学校在他们身上的开支比起他们的高年级同学要少得多，而他们支付的却是同样高的学费。学校在净收入方面的损失，相对于他们的人数和总的学费收入很不相称。没有这些学生，学校的运动、联谊和社交设施要作出重大的调整 留给校友们的将是痛苦的嚎叫。

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存在，造成下述两个必有其一的不良结果。一方面，大学可能会成为一所发展过快的畸形学院。在那里，一位教授的成功取决于他使学生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以及他在课外对学生道德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力。在这样一所高校 指导教育政策的是学生的意见 或者甚至是学生的书面意见。另一方面，大学可以从大一和大二学生那里赢得收入，将他们交给获得教学职位而不是研究员职位的研究生。在这种情况下，职位的升迁取决于研究。但是对本科生教学的兴趣也是一项明确的义务，因此一所试图招收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大学最后既做不好大学工作，也做不好学院工作。这类情况目前几乎在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或多或少存在。

我只能想到一种方法使大学能够接纳大一和大二学生，做好他们的工作，同时又很好地履行大学的义务。这就是要认识到大学可以通过揭示什么是普通教育来对公共教育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普通教育应该在中学三年级至大二结束这段时间进行。我没有看到公立学校花费过时间和精力去发展适合于普通教育的组织方式和教学内容，我看到的

是一个大学系科是如何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但是 即使有这样的希望和态度 要推动大一和大二的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几乎没有大学对公共教育感兴趣，或在其中发挥重大影响。对于这些大学，惟一的答案是取消大一和大二。其次，即使一所大学有能力发展公共教育项目，它是否应该这样做也是个疑问。一所大学在高等教育问题上的麻烦已经很多了，承担起慈善性工作的重担不管如何有价值，只会降低大学在履行本职工作方面的效率。

有一个方法也许能使这类慈善工作避免这种不良的结果——从事普通教育的系科必须独立于甚至脱离大学。它们要毗邻大学 以便利用大学的设施和大学的工作人员 又要与大学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使自己能在没有大学其他系科干预和控制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问题。这类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如果出现过 它能否取得成功 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从学院和大学工作目标的不同引起的混乱走向有序。

对金钱的追逐意味着一所大学必须吸引学生。要做到这一点 学校必须有吸引力。在人们看来 这就意味着学校必须要作出超常的努力向年轻人提供食宿和娱乐条件。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和高等教育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会猜想学生是看重这些的。遍及所有学院和大学的对体育运动和社交生活的重视 已经成为导致学校混乱、削弱美国高等教育的罪魁祸首。

一般认为 学生总希望教育是有趣的 而家长总希望教育是安全的。因此，大学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精力保护学生的身体和道德福祉，家长一定会感到他们的子女是掌握在好人

手里。至于这些人是否已经没有精力，那没有关系。系科必须抛开本职工作，将精力转移到改进委托给他们的某些人的行为和健康的这些不符合他们志趣的工作上来。

对金钱的追逐导致注重数量，注重数量造就了美国的教育评估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年轻人在智力上的进步取决于他们在校的出勤时间、所修的课时以及在授课老师主办的考试中重复上课内容的比例。诸如此类的标准，决定了学生从一个教育单位升到另一个教育单位，是专业性学院入学和毕业的依据。显然 这些标准实际上是诚实、顺从和记忆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它们应该被看做是智力的真正指标。这些标准之所以被采纳，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些武断的和机械的方法 以应付大量的学生 而这些方法是最简便的。任何其他的方法都会迫使我们考虑我们的课程，并制订出成绩测试的方法，而大量的学生使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方面的考虑。

在大学中，对金钱的追逐体现在一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可能会从校长和学校董事那里找到这一点，也可能会想他们最不可能听到此事的地方会是系科的会议室。但恰恰相反 许多教授在对任何改进教育的建议作出即时反应时 往往会流露出对大学收入的关切，因为他们在要求增加他们自身的研究经费时，大学这方面的收入严重不足。当这类建议被提出时 往往会得到两种回答 学生不能做这项工作 以及大学吓跑学生会减少收入。这些回答通常意味着作出这种回答的教授们不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既然这种事情不能作为公众认识问题处理，那么必须转而提出一些慈善的理由。

实际上，学生会旨在改善他们教育状况的课程作出反

应。通常的情况是，在教授们对这类案例作出非常可怕的预测之后，反而有更多和更好的学生希望入学。他们就是冲着本应将他们吓跑的那些革新措施去的。在我的经验里，这种情况已发生在荣誉课程、普通课程、普通考试以及课程学分和出勤要求的废除上。

比追逐金钱更为重要的一个混乱因素，就是我们混乱的民主概念。这影响到了教育的年限、内容和控制。根据民主这一概念，一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接受公共教育的年限，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及获取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任何学位。根据民主这一概念，教育应该对公众的意见作出即时的反应，它的教材和方法可以由社区、社区代表甚至是社区那些比较不承担责任的成员详细加以调整。

是什么决定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答案是经济状况。当遇到劳工紧缺、工作机会很多的时候，免费教育就会限于很短的一个年限，甚至连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也提出免费教育应限于小学三年时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醒我们，在美洲殖民地，一位带着四个子女的寡妇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她的子女很早就开始对家庭经济作出贡献。这种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能希望通过使青少年和退休人员离开劳工市场来解决成年人的失业问题。那些退休人员也许会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但是青少年却不能，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活动。

迄今为止，我们只发现了教育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我认为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教育制度混乱的一种延续，它是应付教育制度缺陷的一种尝试。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它几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能或不愿从书本上学习的学生，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却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它可以学着做得更好。作为教育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的主要弱点是在选择对象方面缺乏明确的基础。如果目前学校是面向那些能够通过传统方法学习的人，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面向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那么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应该将那些能够通过传统方法学习的人交给学校，而学校应将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交给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

当然，我希望学校在方法上能够有所改善，发现如何将教育传达给不能阅读的人的方法。随着他们在这方面的发现，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的数量可能会减少。不过应该明确的是，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必须在大约 20 岁之前向年轻人提供某种类型的教育或半教育活动。即使过了经济萧条期，我们也将处于同样的一个处境，因为近年来的技术进步表明，未来的工业界将比以往需要更少的工人。

设立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罗斯福的新政之一，始于 1933 年，为救济失业青年而设。1935 年，共有 52 万名失业青年在 2600 个营地从事土壤和森林保护以及国家公园等市政工作。该队营地受美国陆军部领导，除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外，对青年文盲进行读写教育，并开设正规的中小学水平的学术性和职业性课程。自 1940 年 5 月至 1941 年 11 月，有 66 万青年营员接受 4000 门课程左右与国防有关的职业训练课程，包括汽车机械学、金工、木工、电工、焊接、飞机制造等。虽然该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培训战时工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 1942 年后在国内受到批评，旋即停办。——译者注

因此，经济状况决定了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目前和今后的经济状况确定一般年轻人享受的公共教育的终点将会设在约大二结束时。这意味着公立的初级学院将成为美国特有的教育机构，正如迄今为止的公立中学 (high school) 那样。

我可能在这方面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初级学院成为美国特有的教育机构时，坚持从大一开始开设四年制课程并最终导向学士学位的大学和学院将会感到一丝困惑。我们可以期望看到在有中学的地方就有初级学院。在这个国家，初级学院已经有 450 所，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其中有 85% 的公立初级学院设在中学的校舍里。因此，人们会发现接管中学教学的最后两年，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四年制的普通教育不是件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一般的年轻人待在家里，并在学院完成大二的学业。如果他在初级阶段之后便完全结束学业，他也不必进大学。从招收大一学生开始的大学和学院将发现，它们的大一和大二学生仅限于当地学生，以及那些有钱在年龄相对较小的时候离家求学的学生。

这一过程已经走得很远。对几乎所有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大一学生的来源作的分析表明，其中至少有 75% 的学生来自距学校 100 英里以内的地区。拟议中的罗彻斯特大学奖学金和哈佛的国家奖学金，就是为了把这种情况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它们将不会成功，因为它们与美国教育的必然的和流行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可以期望在大一和大二阶段，本地学生占有绝对的多数；它们也可以期望大一和大二学生的数量相对于学生总数而言出现下降。去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中，有 64.3%，即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有在一所或一所以上其他学校就读的经历。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谈论学生的大一和大二的学习是为日后的工作作准备是非常愚蠢的；讨论起始于大一的一套四年制课程也是非常愚蠢的。特别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使我们自身得到发展 并鼓励初级学院制定一项明确的普通教育计划，使学生既可以在大二结束后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也可以继续进大学深造。

不过出于教育民主化的考虑，你会明白经济状况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强迫我们将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延长至大二之后。免费教育应该超越这一水平，而且应该更加全面和丰富，但是它应该仅仅面向那些有能力从中受益的人们。为繁荣学术、改进职业和培养心智提供机会 也许是各州的最高职责。如果它允许纳税人的子女随心所欲地接受高等教育，那它只会贬低这些目标并阻碍它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学位不再有任何意义，而且大学的确不应该继续存在。

我们的民主观使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同样数量和类型的教育 这体现了我们全体国民对学位的热情 以致后来温德尔 (Barrett Wendell) 希望通过一出生就向每个美国公民授予学士学位来减轻这种热情。我对此事的判断是，我们不能期望修完大二课程的学生平静地离开学校，除非那时他们被授予学位。

如果我们那时颁授了学位，那么它能代表什么呢？它应该代表一个良好的普通教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普通教育，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它传授给那些不能阅读的人。我们必须为这两个问题寻找答案。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发现什么是普通教育，一部分传授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因为一个明确的课程的第一个结果是人们有兴趣了解它，即使通过书本受些痛苦也在所不惜。民主应该意味着这类课程从

头至尾都要向所有人开放；应该允许学生按照他自己的速度学习以及在他看来已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考试，以适应个体不同能力的需要。然而，民主并不是要求高等教育向那些具备独立的智力工作所需的兴趣和能力之外的人开放。在这个国家，确保一所大学的惟一希望是注意到大学是从事独立的智力工作之家。大学应该对民主作出贡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学独立的智力活动受到了由于我们对民主的混乱认识而造成的另一个后果的威胁，这一后果是我们对民主控制的混乱认识造成的。我承认美国教育的目标、方法和课程问题是如此的混乱，以致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 尽管教育的情况最为千变万化 每个公民却都确信自己是一个教育专家。在公立院校，对社区进行财政控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一方面涉及社区能在教育方面投入多少，另一方面更涉及如何使用这笔钱。作为公众利益恰当的合法代表，他们可能会正确地决定必须削减一所州立大学的总体费用 但是具体应该削减哪些项目 必须由教育工作者决定。在捐办的院校，社区的利益在于确保该法人团体遵守法律。如果社区不喜欢该法人团体的行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手段要求它进行变革。但是一所捐办的大学不能修改其教育政策，因为报社的编辑们正想以牺牲大学为代价努力增加他们的发行量，政治家们也想以牺牲大学为代价来扩大他们的影响。

学术自由简而言之意味着，如果我们将教育和研究的管理交给那些懂行的人，我们会获得最好的结果。以公众为名规定教育的方法和内容 决定研究的目标 这些行为是对学

术自由的侵犯。企图对教授的私人生活和当众发表意见进行控制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属于企图干预公民的自由。州可以决定教育经费的数量，可以通过法律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进行管理，但是这类民主主义的观点与公民可以告诉教育工作者如何从事教育工作这类完全非民主主义的观念毫不相干。与公民可以告诉教育工作者如何生活、如何投票、如何思维以及如何说话这类谬论更扯不上边。

在这个国家，校友这一奇怪的现象发挥着不可思议的，时常又是非常可怕的作用。当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会觉得一所学校的受益者认为应该由他们控制学校，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理由，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如果你认为学校的毕业生们因为向学校交了钱就自认应该控制大学，那么就请恕我提醒你，他们所发出的噪音是与他们所支付的钱成反比的。校友们的热情是可取的，可以有助于保护母校免受公众侵害，并通过自身体现母校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幸的是，他们的能量往往被引导到别的方面。他们对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非常关心，而且他们的雄辩能力以及有一天可以促使他们慷慨解囊的希望强化了大学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兴趣。在那些已受惠于高等教育的人尚不能比任何别的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大学的情况下，指望那些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能理解什么是大学，那就要求太高了。任何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都会告诉你，在立法机构没有什么比校友更危险。大多数捐办大学的校长会告诉你，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最反动的分子就是那些动辄大声叫嚷的毕业生。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我们的思维是如此的混乱，以致我们甚至不能使我们的学生明白我们正在尝试做些什么。

学校的董事与校友不同，他们至少无可置疑地拥有控制学校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越明智，就越不会去试图行使这种权利。他们在财产的管理和大学的解释方面比系科的教职员更加胜任，或者应该更加胜任。但是一所大学如果由学校董事负责运作，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那么怎样才能不发生这种情况呢？学校董事们一般都不是教育工作者，通常也不住在学校所在地。如果他们又是校友，他们必须克服这一利益集团所固有的一些恶习。如果他们出于自愿去着手处理一个教育问题，他们只能偶尔作出正确的决定。

因此，公众可能会适当地指望学校的董事对学校进行明智的管理，但是并不会强化董事会具体运作的职责。一所州立大学的董事们以根据法律董事对大学负责为借口，近来声称他们有权禁止系科的教职人员考虑某些问题。但是，学校董事的一般职责不能扩展到学科的内容、课程的内容或教职人员的资格方面，这些事情属于技术层面，是他们无法胜任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职责限于选择一个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行政班子。如果这个班子不称职，那么他们就应另选一个。试图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只会增加混乱。

除了追逐金钱和误解民主之外，我还想再加上一个重要原因以解释我们目前的混乱状况 这就是对“进步”(progress)概念的错误认识。我将在本书剩下的三章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概念的各个方面。这里我可以通过迹象来谈论它们。我们的进步概念是指每件事情变得更好，而且必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信息在增加 我们的科学知识在扩充 我们的技术装备在范围和质量上都远胜我们父辈所了解的。

尽管经济萧条动摇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仍然坚持进步的

信念 仍然坚信这一信念的普遍适用性。政治、宗教甚至教育都在进步。因此在知识上我们毫不犹豫地与过去决裂 古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 他们从没有见过蒸汽发动机、飞机或收音机，而且似乎也很少意识到实施工厂制度的可能性。既然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中心事实，古人还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说的呢？^①

例如 笛卡尔 (Descartes)、休谟 (Hume) 和罗素 (Rousseau) 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下述想法是荒谬的，即他们应开始思考，就好像以前别人从没有思考过。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过是很自然的事。人类已经进步到了有必要抛弃以往的错误，开始发展一个真正明智的事业的阶段。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似乎是数据积累的结果。信息越多 发现也越多 发明越多 进步也越多。因此 推动进步的方法是获取更多的信息。各门学科一个接一个地脱离了哲学，然后又相互独立 而进步却依然在继续。终于 大学的整个结构崩溃了。当社会科学、法学甚至哲学和神学本身都变成经验性、实验性和进步性的时候，经验主义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进化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这些发展。它为经验主义提供了帮助和安慰，并特别乐于在教育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众所周知 进化证明年复一年都有稳定的进步 不过它也表明每个人的事业都要适应他的环境。显然，适应环境

参照英国利文斯顿爵士 (Sir R. W. Livingstone) 最近的谈话：“希腊人不能广播埃斯库罗斯 (Aeschylon) 的三部曲 但是他们能够写出这个三部曲。”

埃斯库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相传写了八十多个剧本，现存《被缚的普鲁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七部悲剧。——译者注

的方法是多了解它。因此，经验主义不但已取代思辨成为研究的基础，也取代后者成为教育的基础。通过一些轻易的步骤，它逐渐导向职业教育主义，因为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你自己未来环境的事实（特别是如果你喜欢金钱）应该尽可能直接和有用。

这样，我们从进步的概念开始，以一种反理性主义结束。后者实际上否认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是一种动物，而且也许比其他大多数动物都更加聪明。照此，一个人可以被训练成最聪明的动物。因此，认为教育应该是开发人的心智的想法当然是荒谬可笑的。教育必须包括有关当代工业、技术、财政、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或多或少详细的概括研究，以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这些情况，并将自己和同伴的不舒适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当代的时代潮流造就了当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反理性主义的大学。

从术语上看，一所反理性主义大学是一个矛盾结合体，难怪其理论依据也非常古怪。例如，有伟人的教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你不必注意你的教学内容或你的调查内容，你只需将伟人介绍给系科，只要他们在校园中存在就有激发和鼓励作用，他们的教学如何词不达意或他们的研究如何晦涩难懂就无关紧要了。正如谚语所说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这是有关处于一根原木两端的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和学生之间令人厌恶的传闻的一个翻版。

在这个国家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这根原木太长，霍普金斯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太大，而坐在原木两端的人又太多，无法使这一传闻合理化。当然，我们应该尽力将伟人引入教育。每个大学校长都应努力为他下面的系科争取尽可能多的伟人，

但是他永远不要期望能争取到很多，即使他见到一个熟悉一个。如果一位大学校长成功地发现了一些伟人，他不能期望使他们在一个束缚他们手脚的机构和一个同时包罗万象的课程中——特别是那些与这些伟人背道而驰的课程中——成为有用之材。事实上，伟人的理论是一个借口，一个托词，一个对有关我们没有明智的高等教育课程的指责的空洞回答。它等于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课程；如果我们想，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个。但是如果你只接受伟人理论，你会免去我们思考的麻烦。

我们设计的另一个理论是性格培养理论。情况可能是，我们不去教我们的学生任何东西，但是能教些什么呢？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造就在美国的环境下知道如何去做的完全融合的年轻的美国人。^①在美国的校舍里相互交往，与文质彬彬的教授们来往，加上其他日常的活动，会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人。^②既然性格是选择的结果，那么除非你为了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而训练心智，否则就很难看到你是如何发展性格的。学院式的生活表明，本科生的选择取决于思辨之外的其他考虑。无疑，良好的交往、美丽的校舍、如茵的绿草、可口的食物和良好的锻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好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就是每个假日酒店的广告上

见福德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校长甘农教父的讲话，《纽约先驱论坛报》，1936年6月26日第21页。“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广泛联系的人、社会生活与信息知识一样得到认真发展的人、带有明确和易辨的大学印记的人。”

^② 对这一主题的其他说明，请见《耶鲁同学会周刊》的一篇文章，1936年5月1日第7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课程是无足轻重的，学生的确最好是通过与其他学生和教授的非正规交往来进行自我教育。如果这是真的，就没有理由担心教什么。